

論趙樹理的創作

茅

化新堂



作創的理樹趙論

著等盾 茅



行發店書華新北華



論趙樹理的創作

著者：茅盾等

編輯者：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

出版者：華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華北新華書店

一九四七年九月出版



趙樹理

目 錄

- 論趙樹理的創作.....周揚（一）
關於『李有才板話』.....茅盾（二六）
論趙樹理的小說.....茅盾（二〇）
『板話』及其他.....郭沫若（二三）
讀了『李家莊的變遷』.....郭沫若（二五）
人民文藝的傑出成果.....馮敬（二八）
『李有才板話』.....言可（三一）
大家看看『李有才板話』.....吳文遞（三五）

論趙樹理的創作

周揚

在被解放了的廣大農村中，經歷了而且正經歷着巨大的變化。農民與地主之間進行了微妙而劇烈的鬥爭。農民為實行減租減息，為滿足民生民主的正當要求而鬥爭，這個鬥爭在抗戰期間大大的改善了農民的生活地位，因而組織了中國人民抗敵的雄厚力量。抗戰勝利以後，減租減息與反奸、復仇、清算的鬥爭結合起來，鬥爭正在繼續深入發展。這個鬥爭將摧毀農村封建殘餘勢力，引導農民走上澈底翻身的道路。經過八年抗戰，農民已經空前地覺悟和團結起來了。他們認識了他們貧窮的真正原因，他們決心為根本消滅這個原因鬥爭。他們把鬥爭會，清算會很正確地叫做「挖窮根」，這就是說，要挖貧窮的根子挖出來，將牠斬斷。農民的革命精力正在被充分的發揮，這個力量是沒有什麼東西能夠抗拒的，是無窮無盡的。牠正在改變農村的面貌，改變中國的面貌，同時也改變農民自己的面貌。這是現階段中國社會最大的最深刻的變化，一種由舊中國到新中國的變化。

這個農村中的偉大的變革過程，要求在藝術作品上取得反映。趙樹理同志的作品就在一定的程度上滿足了這個要求。

趙樹理，他是一個新人，但是一個在創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準備的作者。二位在成名之前已經相當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農民藝術家。他第一篇為人所知的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在一九四三年發表之後，立刻在羣衆中獲得了大景讀者，僅在太行一個區就銷行達三四萬冊，羣衆並自動地將這個故事改編成劇本，搬上舞台。接着發表了中篇『李有才板話』，這是一篇非常真實地，非常生動地描寫農民鬥爭的作品，簡直可以說是一個傑作。不久以前，又發表了同樣主題的長篇『李家莊的變遷』。

我們面前是三幅農村中發生的偉大變革的莊嚴美妙的圖畫。

『小二黑結婚』寫的是一個農村中戀愛的故事。故事很簡單：小二黑，一個特等射手的年青漂亮農民，和一位美麗的農家姑娘小芹相好。但是小二黑的父親二孔明和小芹的母親三仙姑，這村子裏的兩位「神仙」，反對他們的結合。二孔明為他兒子收了一個八九歲的小姑娘作養媳婦，但是小二黑不認賤，他對父親說：「你願意養你就養着，反正我不要！」小芹也不認母親為他定下的婚事，把婚禮扔了一地。對母親說：「我不管！誰收了人家的東西誰跟人家走！」你看，他們回絕的多麼乾脆，多麼堅決！當村裏的惡霸金旺兄弟將這對情人雙雙拿住，企圖誣告他們的時候，小二黑一點沒有畏怯，他是

理直氣壯的，因為他「打聽過區上的同志，人家說只要男女本人願意，就能到區上登記，別人誰也作不了主」，結果，自然是小二黑勝利了。作者是在這裏謳歌自由戀愛的勝利嗎？不是的！他是在謳歌新社會的勝利（只有在這種社會裏，農民才能享受自由戀愛的正當權利）。謳歌農民的勝利（他們開始掌握自己的命運，懂得為更好的命運鬥爭），謳歌農民中開明、進步的因素對愚昧、落後、迷信等等因素的勝利，最後也最謂重要，謳歌農民對封建惡霸勢力的勝利。作者對「二孔明」與「三仙姑」的描寫，算得是夠諷刺的了，但當我們看到這兩位「神仙」為自己兒女的事情弄得那麼狼狽不堪的時候，我們真有點可憐起他們來，待到後來看到他們的轉變，簡直要喜歡起他們來了。原來作者攻擊的對象，並不是他們，而只是金旺兄弟，那些橫行鄉里的惡霸們。

在「李有才板話」中，便正面展開了農民與地主之間的鬥爭。鬥爭圍繞在改造村政權與減租兩個問題上。老戶主閻恒元，作者在這個人物身上描出了地主的老奸巨滑的性格，他把持了村政權，操縱了農救會。關於他，李有才曾經編過一段板話：

「村長閻恒元，一手遮住天，

自從有村長，一當十幾年。

年年要投票，嘴說是改選，

選來又選去，還是閻恒元。

不如弄塊板，刻個大名片？

每逢該投票，大家按一按，

人人省得寫，年年不用換，

用他百把年，管保用不爛。」

李有才，這位農民的天才歌手，用他的快板反映了村子裏的事件和人物，表達了農民對於這些事件和人物的情緒的反映。這些快板是多麼真實，多麼暢快，多麼鋒利！正因為這些快板戳穿了閻恒元們的假面，李有才被他們攆出了村子。農民中的積極份子被打擊，分化，收買。年青，熱情，但是沒有經驗，犯了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章工作員被愚弄着，完全蒙在鼓裏，他還說閻恒元是「開明士紳」呢，並且還把閻家山獎為「模範村」呢。然而農民們的眼睛是明亮的，他們唱道：

「模範不模範，從西往東看；

西頭吃烙餅，東頭喝稀飯。」

他們繼續鬥爭着。一個小元變壞了，其他許多「小字號的人物」還是積極的。有才老叔擇走了，還是有人編歌子；他們的嘴是封不住的。當縣農會主席老楊同志，這位從羣衆中生長起來，熟悉羣衆要求，有羣衆作風的人物來到村子裏的時候，那一夥青年積極的農民便好像給吸鐵石所吸引一樣，都團結到他的周圍了。他們重新組織起農救會，發動了鬥爭，改組了村政權，實行了減租法令，鬥爭勝利了。作者是在這裏正確地處理了農村鬥爭的問題，寫出了鬥爭的曲折與複雜性，寫出了農村中的各種人物：地主，農

民，包含積極的，中間的，與落後的；兩種類型的工作幹部。他沒有把人物與行動簡單化；沒有祇寫勝利，不寫困難，祇寫光明的一面，不寫陰暗的一面。他的筆是那樣輕鬆，那樣充滿幽默，同時又是那樣嚴肅，那樣熱情。光明的，新生的東西始終是他的作品中的支配一切的因素。

『李家莊的變遷』的主題，同樣是寫的農民與豪紳地主之間的鬥爭，而且這個鬥爭範圍更廣，過程更長，因而也更激烈，更殘酷。前兩篇作品所特有的幽默的調子在這裏被一種沉重的空氣所籠罩。農民主人公鐵鎖的性格也比那些『小字號的人物』更深沉，他有比他們更多的經歷，他的活動更帶自覺的性質。全書的故事就是以他作中心來展開的。他是李家莊的一個外來戶，受盡了當地豪紳地主的剝削壓迫，跑到那裏也逃不出他們的魔掌。祇有在太原和一個叫做小常的青年共產黨員的偶然相識，才第一次在他的生活上投射了一線光明。這個小常幾乎成了他以及後來他的全村的偶像。抗戰開始，小常恰好被派到他們縣裏來工作，他親自到了他們的村子裏，在這裏轟轟烈烈地開展了議盟會的工作。鐵鎖和農民中其他積極份子冷元白狗都活躍起來了。豪紳地主卒如珍一夥也在加強活動；他們抵抗減租減息，他們想教議盟會不起作用。中央軍，日本人來了，他們便得志起來，對農民實行了血的報復。小常被活埋了。鐵鎖冷元投到了八路軍。而當八路軍第二次解放這個村子的時候，村裏剩下的人，連從前的一半都不到了。鬥爭是殘酷的，而且長期的。作者在故事結尾處寫到了慶祝抗戰勝利大會本來就可以住筆了的罷。

然而他却不能不加寫一場爲自衛戰爭歡送參戰人員的大會，向讀者強烈地暗示了：鬥爭還在前面！他灌輸了讀者以勝利信心和鬥爭勇氣。

『李家莊的變遷』雖只寫的一個村子的事情，但却襯托了十多年來山西政治的背景，涉及了抗戰期間山西發生的許多重要事件，包含了歷史的和現實的政治的內容；可以看出作者在這裏有很大的企圖。和作者的企圖相比，這篇作品就還沒有達到牠所應有的完成的程度，還不及『小二黑結婚』與『李有才板話』在他們各自範圍之內所完成的。牠們似乎是更完整，更精練。但是就作品的規模和包含的內容來說，『李家莊的變遷』自有牠的爲別的兩篇作品所不可及的地方。

在巡視了趙樹理同志的這三篇小說之後，我想說一說在他的創作中有些什麼特點，什麼獨創的地方，特別值得研究，值得學習呢？我打算說兩點：一、是他的人物的創造；二、他的語言的創造。

作者在人物創造上，第一個特點就是：他總是將他的人物安置在一定的鬥爭的環境中，放在這鬥爭中的一定地位上，這樣來展開人物的性格和發展。每個人物的心理變化都決定於他在鬥爭中所處的地位的變化，以及他與其他人們相互之間的關係的變化。他沒有在靜止的狀態上消極地來描寫他的人物。

首先，他寫了農民中的積極分子和工作幹部。他們是站在鬥爭的最前線。創造積極人物的典型，是我們文學創作上的一個偉大而困難的任務。原因是：一、作爲我們遺產

的過去優秀的作品幾乎都祇寫了農民消極的落後的方面；二、現實中新的人物，新的個性也還在形成、生長之中。作者雖還沒有創造出高度集中的典型，像阿Q那樣的，但他無論如何寫出了新的人物的真實面貌，那些「小字號的人物」們可以看作新的農民的集體的形象。而且，是多麼生動的，可愛的形象呵！但是作者也並沒有將他們理想化。這些都不過是普通的農民；他們年青，熱情，有時甚至冒失；他們所身受的豪紳地主的剝削壓迫，迫使他們不能不走向革命。他們在苦難與鬥爭中漸漸成長起來，他們漸漸的學會了鬥爭的方法和策略；他們敢說敢幹，且又富於機智和幽默。每個人都在鬥爭中顯示出各自的本領與才能。正如『李有才板話』中的老楊同志所說的，「老槐樹底有能人」。羣衆的鬥爭——這就是決定一切的力量。鬥爭教育了農民，培養出了他們中間的積極份子。趙樹理同志的創作就反映了農民的智慧，力量和革命樂觀主義。在老楊同志這個人物身上，他創造了一個傑出農民幹部的成功形象。

作者同樣出色地描寫了地主惡霸和他們的「狗腿」。他的重點也是放在他們和農民對立，和新政權對立的關係上。他們對於農民的要求減租與組織農會，改組村政權等等活動，進行了頑強的堅決的抵抗；這種抵抗在不能使用公開暴力的時候就憑藉狡猾的手腕；他們「一肚子的骯髒計」。他們充分地利用了農民的自私，落後，和工作幹部的沒有經驗，主觀主義，官僚主義。『李有才板話』中『丈地』一章便提供了關於這一方面的非常特出的描寫。

農民與地主之間的界線是劃分的十分清楚的。農民憑着他們的階級本能和經驗，對於這個分界一點也不含糊。我們祇要看看，當小元還是積極份子的時候。那些「小字號的人物」對他多麼親，而一當小元做了武委會主任，受地主同化之後，他們對他就疏遠了。他們前後態度是完全不同的，他們從心底發出了兩種不同感情。兩個農民在被指派給小元効地的時候有段對話是妙極了，我祇引其中的兩句：

小福道：「頭一遍是咱給他効，第二遍還教咱給他効！」小順道：「那可不一樣！頭一遍是人家把他送走了，咱們大家情願幫忙，第二遍是人家陞了官，不能効地了，派咱給人家當差。早知道落這個結果，幫忙？省點氣力不能睡覺？」

作者也寫了農民中的落後份子，如像『李有才板話』中的老秦：他「吃虧，怕事，受一輩子窮，也看不起窮人」，但他也有個好處。「祇要年青人一發脾氣，他就不說話了」，他到底還是善良的。落後的人物在鬥爭的環境中也不能不起變化。不祇這個老秦變了樣子，像有些作者寫人物轉變那樣；他祇是着重寫了環境的力量，他雖沒有告訴你他的人物轉變的怎樣，但却叫你不能不相信他們的轉變。

作者在描寫他的作品上，其次一個特點就是：他總是通過人物自己的行動和語言來顯示他們的性格，表現他們的思想情緒。關於人物，他很少做長篇大論的敘述，很少以

作者身份出面來介紹他們的，也沒有作多少添枝加葉的描寫。他還每個人物以本來面目。他寫的人物沒有「衣服是工農兵，面貌却是小資產階級」；他寫農民就像農民。動作是農民的動作，語言是農民的語言。一切都是自然的，簡單明瞭的，沒有一點矯揉造作，裝腔作勢的地方。而且，祇消幾個動作，幾句語言，就將農民的真實的情緒的面貌勾畫出來了。讓我再從『李有才板話』中引一段，這是寫農民們在聽到他們村長撤職的消息時的反映：

「一進門，小元喊道：『大事情！大事情！』有才忙道：『什麼？什麼？』小明答道：『老哥！喜富的村長撤差了！』小順從炕上往地下一跳道：『真的？再唱三天戲！』小福道：『我也算數！』有才道：『還有今天？我當他這飯碗是鐵捲繩住了！誰說的？』小元道：『真的！黨工作員來了，帶着公事！』小福的表兄問小福道：『你村裏跟喜富的仇氣就這麼大？』

就這麼短短的對話，聽來是那樣輕鬆，那樣歡快，然而又是多麼有力地表現了農民對於地主惡霸的仇恨心理。這種仇恨在『李家莊的變遷』中就成了爆發式的；農民們在龍王廟將漢奸地主李如珍活活打死的那個血淋淋的場面，也許會有人感覺到農民的報復太殘忍了罷；但是請聽一聽農民怎麼說的：

「這還算血淋淋的？人家殺我們那時候，廟裏的血都跟水道流出去了！」

語言和行動是緊緊結合的。語言表現行動，而又凝成於行動之中；所以總是簡練的，生動的。鬥爭的語言和日常生活語言完全融合起來了。農民的機智和幽默在鬥爭的火燄中磨練得光芒四射。他們把諷刺的話叫做「開心話」，叫做「扔磚頭話」；這就是對豪紳、地主、官僚、惡霸、「狗腿」們「扔磚頭」，這是鬥爭的語言。就這樣，作者從這些行動和語言中，將新的人物的性格顯示出來了。

最後，作者在處理人物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明確地表現了作者自己和他的人物的一定的關係。他沒有站在鬥爭之外，而是站在鬥爭之中，站在鬥爭的一方面，農民的一方，他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他沒有以旁觀者的態度，或高高在上的態度來觀察與描寫農民。農民的主人翁的地位不祇表現在通常文學的意義上，而是代表了作品的整個精神，整個思想。因為農民是主體，所以在描寫人物，敘述事件的時候，都是以農民直接的感覺，印象和判斷為基礎的，他沒有寫超出農民生活或想像之外的事體；沒有寫他們所不感興趣的問題（當然寫別的主題的作品，又是另外一回事）。他把每個人物或事件在羣衆中的反映及所引起的效果，當作他觀察與描寫這個人物或事件的主要角度。農村的事情，還有誰比農民了解的更深切，更透澈的嗎？對於地主，有誰比農民更熟悉，更清楚底細的嗎？就是對於農村中的幹部們工作的好壞，農民也是最正確的批判者。因為羣衆的意見總是正確的。在《李有才板話》中，李有才的那些真實反映了羣衆意見的抉擇，如果單從形式上看，也許會被看作是中國舊小說所特有的「有詩爲證」一個變體，但我

却以爲牠表現了趙樹理同志創作上的一個重要精神。這是他創作上的羣衆觀點。有了這個觀點，人民大衆的立場和現實主義的方法才能真正結合起來。

若有人懷疑，趙樹理豈不祇是一個農民作家嗎？他的創作的和思想的水平不是降低到了「農民意識」嗎？回答當然不是。他不但歌頌了農民的積極的前進的方面，而且批判了農民的消極的落後的方面。他寫了好的工作幹部，這在農村中實現無產階級領導的骨幹，沒有這骨幹，農民的翻身是不可能的；同時也批判了壞的工作幹部。這好與壞的一個主要區別的標準，就是能不能和農民打成一片，替他們解決問題。老楊同志和章工作員的區別就在這裏。兩個人物的對照的描寫充滿了現實的教育的意義。

關於趙樹理同志在人物創造上的基本特點，我所看到的就是如此。現在我就來說一說他在語言上的創造的工作。

他在他的作品中那麼熟練地豐富地運用了羣衆的語言，顯示了他的口語化的卓越的能力；不但在人物對話上，而且在一般敘述的描寫上，都是口語化的。在他的作品上，我們可以看出和中國固有小說傳統的深刻聯繫；他在表現方法上，特別是語言形式上吸收了中國舊小說的許多長處。但是他所創造出來的決不是舊形式，而是真正的新形式，民族新形式。他的語言是羣衆的活的語言。他在文學創作上，不是墨守成規者，而是革新家，創作家。

「文藝座談會」講話以後，學習民間語言，民間形式的努力產生了很多的優秀的結

果。就在小說創作方面，也有成績。但有些作者却往往祇在方言、土語、歇後語的採用與舊形式的表面的模仿上下功夫。趙樹理同志却不是那樣。他執行了他自己作品的創造的任務。

在他的作品中，他幾乎很少用方言、土話、歇後語這些；他決不爲了眩耀自己語言的知識，或爲了裝飾自己的作品來濫用牠們。他盡量用普通的、平常的話語，但求每句話都適合每個人物的特殊身份，狀態和心理。有時一句平常的話在一定的場合從一定的
人物口中說出來可以產生不平常的效果。同時他又採用了許多從羣衆的生活和鬥爭中不斷產生出來的新的語言。他的人物的對話是生動的；漂亮的；話一到了他的人物的嘴上就活了，有了生命，發出光輝。

他在作敘述描寫時也同樣是用的羣衆的語言，這一點我以爲特別重要。寫人物的對話應當用口語，應當忠實於人物的身份，這現在是再沒有誰作另外主張的了；唯獨關於敘述的描寫，即如何寫景寫人等等，却好像是作者自由馳騁的世界，他可以寫月亮，寫靈魂；用所謂美麗的詞藻，深刻的句子；全不管這些與他所描寫的人物與事件是否相稱以及有無關係。要創造工農兵文藝，這片世界有打掃一番的必要。人物與環境必須相稱。如果環境中的甚麼事物，在一個人物的心中是不存在的，即是 he 對這事物不感興趣，這事物與他的生活毫無關係，那末，作者爲甚麼要耗費氣力去寫牠呢，僅僅爲了自己個人的愛好？我們來看一看趙樹理同志怎樣描寫環境：